

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明确将“坚持人民至上”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强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出发点与落脚点。回望百年党史,“人民至上”并非全新提法,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赓续传承,是历经革命、建设、改革淬炼,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完善的执政理念,更是新征程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价值遵循。

“人民至上”理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有着坚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共产党宣言》更是确立了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为中国共产党为民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传统社会认知中,生育、家务、照料等家庭劳动常被视为“私人领域”事务,其经济价值与社会贡献长期被忽视。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转型,“少子老龄化”趋势加剧,双职工家庭在职场与家庭间的双重压力日益凸显。再生产劳动的社会承认不仅关乎性别正义,更直接影响生育意愿、家庭福祉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马克思双重生产理论为基础,旨在系统探讨再生产劳动的价值遮蔽问题,并探索构建社会承认机制的实践路径。

一、理论基石:双重生产、文化传承与家庭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与人类再生产对于社会存续具有同等重要性,后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环节,虽不直接创造市场交换价值,却是所有社会价值创造的根基。这为我们将家庭内的生育、家务、照料劳动纳入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性的哲学依据。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治理智慧和“敬老慈幼”“勤俭持家”的家庭伦理资源,为再生产劳动赋予了超越市场交易逻辑的文化正当性与情感价值,使其回归到维系家庭和谐、履行代际责任的伦理本位上,避免了将其简单物化的认知偏差。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至上”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升华

王佳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落地生根,党的七大正式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开展革命斗争,推翻压迫制度,实现人民政治解放,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国家建设与人民发展,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求,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持续传承发扬群众路线,密切党群血肉联系,为后续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福祉筑牢发展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社会主要

矛盾的转变,邓小平同志立足发展实际,确立“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尺,聚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解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将为民宗旨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准则。

进入新时代,“人民至上”理念完成系统性升级与全方位升华,成为我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价值底色,形成价值、方法、根基“三维一体”的完整执政体系。在价值层面,发展目标不再局限于物质生活保障,而是全面覆盖民生福祉、公平正义、安全保障、精神文化等多元需求,精准对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全方位向往。在实践层面,彻底转变传统单向供给模式,让

人民从发展受益者转变为参与者、评判者、监督者,充分激发群众首创活力。在根基层面,始终坚守群众路线,以密切党群血肉联系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守住百年大党的立身之本。

百年风雨兼程,为民初心矢志不渝。“人民至上”理念历经百年迭代,不变的是我党始终为民的初心立场,革新的是贴合时代、贴合群众的实践路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十五五”规划为民生发展划定新蓝图,唯有始终坚守“人民至上”根本原则,把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作为工作标尺,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才能凝聚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续写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家庭再生产劳动的社会承认机制构建

许丽霞

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家庭建设提升至国家治理与社会文明高度的新时代方略,为破解再生产劳动的“私域”困境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二、现状分析:双职工家庭的劳动分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妇女事业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责,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立体化妇女工作格局。随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的实施,妇女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权利平等逐步实现,然而家庭再生产劳动依然陷入认知偏见和制度保障缺失的双重困境。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双职工家庭进行调研,结果表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出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性别分工模式普遍存在,女性平均每日投入家务与照料的时间占比较高,并且往往更多地承担维系家庭情感关系与隐性统筹管理的无形劳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再生产劳动价值遮蔽的多元复杂成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生产主义逻辑容易将无法直

接货币化的劳动排斥在价值评价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托育服务的短缺、职场文化不经意间对“母职惩罚”的强化,以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持久影响,共同导致了再生产劳动在社会与家庭层面均遭到系统性低估。长三角地区育儿的普遍应对策略是寻求长辈协助,这是对当前双职工家庭照料压力的缓解,但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身心负担,并可能衍生出新的代际矛盾。这些发现共同勾勒出再生产劳动在私人领域中被承担、被依赖,却又在公共价值层面被边缘化的现实状况。

三、机制构建:“伦理—制度—文化”三维协同路径

构建再生产劳动社会承认机制,需要形成一种“伦理—制度—文化”三维协同的系统性路径。首先是伦理规范层面,核心在于重塑社会劳动正义观,倡导“劳动无公私之分”的普遍共识。教育引导与媒体叙事可以共同提升家庭内生生育、照料等劳动的可见度与社会尊重,使家庭照料者的隐性贡献获得应有的价值肯

定。其次是制度保障设计,进一步落实伦理观念。这要求公共政策进行系统性嵌入与创新,一方面要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发展社区互助育儿点,以降低家庭的照料成本与负担,另一方面在职场探索推行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及父母共享的育儿假,以打破基于“全勤模范”的单一评价体系对承担照料责任者的排斥;同时,探索对首婚首育家庭的柔性经济激励与社区服务或社会保障权益相衔接,并研究以税收优惠或专项补贴等形式对家庭再生产劳动给予某种形式的承认与补偿。而所有这些制度努力,最终需在文化维度上获得滋养与巩固,即通过鼓励媒体呈现多元、平等的家庭分工叙事,积极消解传统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并借助企业培训与社区活动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家庭成员更多参与家务与育儿实践,从而在社会基础层面塑造“责任共担、价值共认”的新型家庭文化。这三个维度彼此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指向一个使再生产劳动真正获得社会性承认与支持的未来。

作者系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文化自信与地缘政治视角下软实力时代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博弈

娄兆锋

摘要: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在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本文旨在系统探讨文化自信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文化自信如何影响国家的地缘政治行为、战略选择与国际地位。研究认为,文化自信不仅是国内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更是地缘政治博弈中不可忽视的软实力要素。在全球权力转移、多极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文化自信为国家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物质力量的影响力投射方式,重塑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本文从理论建构、历史演进、现实案例和战略路径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文化自信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深层机制,并提出在新时代条件下增强文化自信以优化地缘战略的理论框架。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发生了较大变革。过去的博弈模式亦发生了深层变动,资源争夺与军备竞赛逐渐被系统化复杂化的多维竞争取代,博弈的关键要素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等,文化自信在此过程中引发学术思考,涉及文化自信如何影响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等问题。

二、文化自信与地缘政治的概念耦合

(一)文化自信的内涵与层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从三个维度说明:第一,对传统文化继承与认同。对历史积淀形成的优秀价值观和行为惯例的充分肯定,并通过学习继承其核心价值。第二,对现实文化创新能力的信任。即对当下文化生产的活跃度、传播的能力和影响力的正面评价。第三,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开放心态。坚持文化主体性,且有选择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要素或

成果,不断推动自身文化的更新。

(二)地缘政治的文化转向。地缘政治理论的更新轨迹,呈现抛开地理要素,转而向多维空间发展,在多维空间中谋求更广泛的博弈。这样的转变符合汉兹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以及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均以地理空间结构以及相对应的物质力量为重要考量。冷战结束后,加入信息技术革命变量,博弈方式发生了“文化转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证实了这一点,文化认同较意识形态具有更加强烈的博弈优势。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针对文化吸引力、价值观感召力和制度塑造力更加重视。表现为文化话语权更具“性价比”,更有说服力;身份政治与国际冲突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文化产业的竞争将凸显深层的价值观之争。数字空间的文化博弈更加激烈。

(三)二者耦合的内在逻辑。文化自信与地缘政治之间多条线索表明了其现存的耦合关系,而非绝对的回答。首先,文化自信塑造国家的地缘政治认知。一个国家对自身的定位,直接关系到其判断力,其国际地位、利益、挑战与机遇,皆与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高度关联。文化自信程度高的国家,战略定力强,且更加具有理性,而非大幅度摇摆。其次,文化自信影响国家的地缘战略选择。文化自信为国家提供了跳出现有话语框架的能力,文化自信的国家在国际关系处理的“工具箱”中有更为多元的选择,协同合作对话等更具影响力,跳出单一的传统干涉方式。同时,文化自信赋予国家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外交方式。再次,地缘政治竞争反过来影响文化自信的建构。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外部威胁等要素变化,会对其文化心理结构产生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

文化自信发生剧烈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带来的文化自信,体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

三、文化自信塑造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与战略路径

(一)话语权建构的质量。文化自信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前提是话语权建构。第一,历史叙事的自主性。文化自信的国家可以用自身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讲出自己的国际合法性和道德资本。第二,理论创新的能力。文化自信使国家能够吸收外来理论的合理部分,并经过筛选、转化和再创造形成自身文化烙印的分析工具。第三,国际话语权的扩大。通过高效的媒体传播、密集的学术交流、畅通的文化外交等方式,在传播网络的空间中争取最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二)文化认同是地缘整合的资源。文化自信还可通过文化认同塑造地缘政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文化认同与联盟关系的建立紧密相关,国家通过文化自信激活并管理此类纽带,成为国家运用的外交政治工具。基于亚洲文化记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基于东正教的文化形成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基于印地语流行文化印度在南亚极具影响力。中国基于自身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提出的交流互鉴主张、印度利用共享的文化资源实施佛教外交、土耳其以奥斯曼遗产和伊斯兰文明代言人的身份发挥对话的桥梁作用。

(三)发展方式竞争过程呈现文化自信的制度外溢。文化自信影响发展方式的竞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为国家发展带来成功时,与其相关的制度、机制或文化等将会成为其他国家研究的对象并加以借鉴。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政治稳定的

前提下逐渐实现的,并成为稳健的经济发展标杆,对其他国家更具参考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极具影响力。

(四)文化外交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战略资产。文化外交是文化自信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最直接路径。通过有意识地将文化资源作为战略资产进行经营和运作,取代短期收益,着眼于长期目标,以更加从容的方式推进此项工作。文化外交的形式多种多样。语言推广,包括孔子学院、歌德学院等;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或通过各类赛事进行体育外交,以及美食文化传播、旅游推广等。尤其在数字时代,文化外交的形态更加灵活,网民通过TikTok等中国互联网络平台,传播网络文学且获得相关读者的青睐,中国影视作品凭借其优秀的制作技术及叙事方式,突出了文化影响力,提升了可见度,搭建好文化生态。

(五)认知主权与算法时代的文化博弈。21世纪第三个十年,文化自信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关系复杂,现如今引入数字技术这个变量,与算法推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强相关。由此引发了“认知主权”的概念讨论,即国家保护其公民信息环境免受外部操纵、维护本土文化叙事自主权的能力。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审视,算法时代的文化博弈呈现出三个显著的新特征。一是文化影响力的传播位移。互联网上的文化内容是否能够传播到受众取决于算法,以及根据不同市场上的用户偏好所决定。二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在重塑文化生产的生态。文本到图像模型,以及大型语言模型运行中受到语料数据的影响,其表面输出显得中性,但特定编码带有文化视角和偏向。

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